

• 社会学研究 •

“凹陷”的社会生活满意度

——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探索研究

郭星华, 张 晶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运用一项全国调查数据对农村社会生活满意度的因子分析表明,影响农民社会生活满意度的维度依次是“社会关系满意度”、“社区事务满意度”、“公共政策满意度”。其中,社会关系满意度、公共政策满意度较高,社区事务的满意度最低,从微观—中观—宏观呈现出比较典型的凹陷形态。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剧的今天,农村权威弱化,基于村规民约的农村传统组织力量较少发挥作用,农民对社区事务的满意度较低与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延续的庇护主义思维有关。提高农村公共政策的满意度是提高农民社会生活满意度的关键,构建农村公共领域必须注重培养农民的自主意识。

关键词:社会生活满意度;凹陷;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1)02-0060-06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农民人均年收入达5153元,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农民生活接近小康水平、生活方式从生活型到发展型转变的历史时期,从主体角度考察农民的生活感受、态度和认知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观生活满意度展现了农民生活各个层次(方面)的心理感受状态,有助于精确地回答以下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有了显著提高?又可分为哪几个层次?本文将从社会生活满意度角度切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分析农民在社会生活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上的具体状态。

一、文献回顾与核心问题

生活满意度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指标”运动。其时,欧美各国逐步走出战争阴影,步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人们愈发认识到生活质量不能单纯运用经济指标考察,必须加入多种主观衡量指标,目前国外已经发展出一些成熟的衡量指标体系。

卡明斯(Cummins)指出,生活满意度是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1]在国内实际调查中,主观生活质量的含义近似于生活满意度。在上世纪80年代林南所做的城市居民生活质

收稿日期:2010-06-07

作者简介:郭星华(1957—),男,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张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第二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社会学,2008—2010)阶段性成果。

量调查、2004—2006年邢占军所做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调查中,主观生活质量基本等同于生活满意度,初用以测量人们的幸福感。^[2]出于简洁明晰的考虑,在本文中,笔者使用“生活满意度”一词,以测量农民在生活三个方面的主观感受、认知与评价。相对于主观幸福感,它仅仅强调了主观生活质量,其分布较为稳定,不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情感体验。^[3]

检视国内关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研究绝大多数以城市居民为考察对象,而较少关注农村居民。即使是涉及到农村居民的少数生活满意度研究,测量的也是在城市情境中生活的农民工,^[4]其生存状态和境遇显然与那些一直在农村生活的居民迥异,难以代表农民整体。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农民整体的调研中,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报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分析了影响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各个因素,包括业余娱乐生活因素、个人经济因素、国家宏观政策因素等,指出: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始终高于中国城市居民,而至2007年,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首次超过农村居民。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处于波动之中。^[5]

纵观以上研究,我们认为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研究仍处在探索之中,研究中所用的变量及其测量指标往往因研究者自身的旨趣而有所侧重。这些研究存在三个不足:一是满意度指标选择的随意性较大,且多集中于微观层面,对于中观和宏观层次的指标缺乏必要的关注;二是追求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解释,而对生活满意度的具体领域的探寻不足。

针对这种状况,我们有必要重新回过头来反省生活满意度的本质含义。戴伊(Day)指出,生活满意度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家庭生活、财产、个人健康、医疗保健、社会生活、工作、个人发展、宗教和精神生活、休闲和娱乐、乡村生活、政府的预算或服务、采购和销售等等。^[1]可见,生活满意度的涵盖面很广,远远不是几十

个指标能够测量的。在现有调研条件下,对农民生活满意度做出全面估量或许是必要的,却无实际操作的可能。因此,本文将仅涉及农民生活的社会生活领域,它包含了两个维度,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二是所参与的社会活动,^[1]具体地考察农民在微观社会关系、中观公共事务以及宏观社会政策^①三个层次上的生活满意度。

在本研究中,我们着重探讨以下问题:首先,王培刚等在2004年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已从以往更多地关注微观层面的问题转向更加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反映城市居民的主导需求开始由经济型向发展型转变,^[6]那么,农村是否存在着同样的趋势?又可分为哪些层次?其次,不同层次社会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二、数据、方法与变量

(一) 数据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10年1月至3月期间在全国的27个省市(除港澳台、沪、宁、青、藏五省市)114个村庄开展的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百村调查”^②。调查面向所有具有农村户籍的18—65岁居民,采取配额抽样方式,即在每个被随机抽取的村庄中发放13份问卷,其中村长1份,村民12份。共发放问卷1521份,有效回收1457份,有效回收率为95.79%。在回收的1457份有效问卷中,普通村民1347份,占92.5%,村长110份,占7.5%;男性占60.40%,女性占39.60%。按年龄分组,18—35岁的青年人占28.32%,35—59岁的中年人占64.2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7.41%,其中有婚史者占88.99%。与2006年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相对比,样本数据在人均纯收入、外出劳动力资源受教育程度、居民住房面积等项目上较为一致,说明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①虽然农民不能直接参与到宏观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但其能对政策满意度作出判断,在农村生活中,对政策的评估成为一项重要的日常活动。

^②该项目主持人为郭星华,课题组成员为秦强、邱洪敏、刘蕾、曲麒麟、张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7、2008、2009级本科部分同学为收集数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致谢忱。

(二) 变量与方法

基于文章的核心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农民的社会生活满意度是怎样的。

本研究共设置了 10 个指标测量社会生活满意度,对每个指标,我们均设置 5 个级别,即从 1 分至 5 分,分别代表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所得描述统计见表 1。

表 1 社会生活满意度指标描述

描述统计量 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对自家与邻里关系的满意度	3.856254	.7576721	1447
对自己与家人关系的满意度	4.115118	.7063165	1442
对自己与亲戚关系的满意度	4.007639	.7233406	1440
对自己与朋友关系的满意度	3.984028	.727038	1440
对自己业余生活的满意度	3.161898	.9079259	1433
对公共文化娱乐生活的满意度	2.719061	1.024593	1406
对村内安全维护活动的满意度	3.225851	1.024593	1439
对村委会组织活动的满意度	3.19986	1.046085	1431
对国家教育政策的满意度	3.600278	.9463966	1441
对国家医疗政策的满意度	3.536161	1.00784	1438

由表 1 可知,农村居民满意度较高的指标为自己与家人的关系的满意度、自己与亲戚的关系满意度,其均值超过了 4,达到了“比较满意”的水平;对自己与朋友的关系、与邻里的关系则紧随其后,总体上可认为,农民的社会关系心理感知良好;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政策持相对肯定的态度,其均值都超过了 3.5,说明农民对国家政策的评价尚可;对于村内事务中的若干具体项目,如对公共文化娱乐生活的满意度评价最低,其均值仅为 2.719061。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由于以上 10 个指标中出现较多信息冗余和重叠,故有必要对其进行合并和化简。本文

采取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法提炼主要信息。首先,对 10 个指标进行 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和 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发现,KMO 值为 0.7809,说明该 10 个指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Bartlett 球度检验在 0.000 水平上显著。证明可以应用因子分析进行化简。

其次,利用主成分法提取因子,选取特征根大于 1 的 3 个因子,并利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进行旋转。所得到的各指标因子负载情况如下表 2。

表 2 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载系数

负载系数 指标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共同度
对自家与邻里关系的满意度	0.7901	0.1252	0.1104	0.6521
对自己与家人关系的满意度	0.8469	0.0232	0.0614	0.7215
对自己与亲戚关系的满意度	0.8696	0.1169	0.0801	0.7763
对自己与朋友关系的满意度	0.8431	0.1075	0.0691	0.7271
对自己业余生活的满意度	0.1948	0.5965	0.1043	0.4047
对公共文化娱乐生活的满意度	0.0735	0.7356	0.0877	0.5542
对村内安全维护活动的满意度	0.1221	0.7813	0.1636	0.6522
对村委会组织活动的满意度	0.0902	0.8004	0.1730	0.6786
对国家教育政策的满意度	0.0951	0.0918	0.8874	0.8050
对国家医疗政策的满意度	0.0892	0.1834	0.8614	0.8360
特征值	3.61680	1.93729	1.20094	
方差贡献率	28.92%	22.31%	16.32%	
累积方差贡献率	28.92%	51.23%	67.55%	

对这三个因子的考察发现,除了与自己业余生活的满意度因共同度小于0.5而被筛除出模型以外,其余指标的共同度均在0.5以上,三个因子较好的拟合了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其余9个指标。因子1在对自己与邻里的关系、自己与家人的关系、自己与亲戚的关系、自己与朋友的关系的满意度上负载系数较高,可命名为“社会关系满意度”;因子2在对公共文化娱乐生活的满意度、对村内安全维护活动的满意度、对村委会组织活动的满意度上负载系数较高,可命名为“社区事务满意度”;因子3在对国家教育政策满意度、对国家医疗政策的满意度上负载系数较高,可命名为“公共政策满意度”。三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55%,包含了10个指标中的大部分信息。

对于每个因子利用回归方法(Regression Method)计算其因子得分(Factor Score),得到各个满意度的描述统计。见表3。

表3 各层次满意度

变量 统计量	社会关系 满意度	社区事务 满意度	公共政策 满意度
均值	4.1089131	2.02957	3.337866
标准差	.7191141	.8969512	.9806223
观测样 本数	1388	1388	1388

三、生活满意度凹陷:呈现与分析

由表3可知,农民的社会生活满意度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对社区事务的满意度较低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称此情形为“满意度凹陷”(图1)。

即在微观—中观—宏观不同层次上,农民的满意度存在明显的分异:对于微观层次的社会关系、宏观层次的公共政策满意度较高,而对处于中观层次的社区事务,其满意度较低。为

什么农民的公共社区生活会出现如此明确的分异?造成这种满意度凹陷的原因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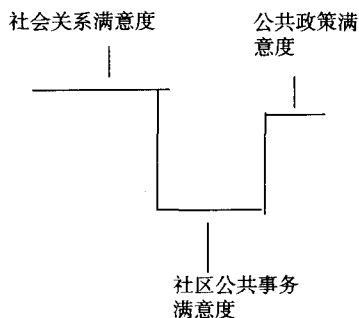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生活满意度“凹陷”示意图

首先,农民微观层次的生活满意度较高,表明农村居民的人际状况较好,农民与家人、亲戚、朋友和邻里的私人关系总体上仍是融洽的。在最为主观的经验领域,农民对于个人关系的评价和认知仍是非常正向的。

从本质上来讲,在村庄内部,以婚姻和血缘缔结的亲戚、亲属关系,以及以地缘和业缘缔结的朋友、邻居的关系都属于初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农村社区中的初级关系变迁问题,近年来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①,其中严云翔的研究结论颇有影响力。他基于下岬村的人类学调查指出,在现代性的发展背景下,农民私人生活历经变迁,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增长,却未受到相应的道德和伦理约束,导致了一种畸形的个人主义,在亲密的私人关系领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疏离和变化,表现在:家庭内部对老人的身心虐待现象增多,亲属、邻里之间的关系淡化等等。^[7]当然,这其中并不能排除严云翔所用个案的普遍性问题,但退一步讲,如果严云翔的结论在中国村庄中普遍成立,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农民的客观互动与主观评价如此不一致?为什么农民在“私人关系变革”的时代仍然对关系评价持较高的满意度?不可否认的是,有的农民存在着或多或少“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因素,在回答问卷时会有意识地倾向于给出较高的评价^②;然而除却这种因

①如陈柏峰对湖北京山县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的研究中,揭示了农村老年人和年轻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参见,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4)。

②“对社会关系不满意”在一些农民看来就意味着自身的人际(社会)关系失败。这在村庄共同体中是非常严重的,意味着个人不被他人认同和接纳,他人对个人价值的评价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在调查中,可能存在着农民故意高报自己满意度的情况。

素,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探寻这种相悖背后的原因。诚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的发展,“初级关系发生了变迁……家族依附被逐渐消灭,而对它个人义务不断增长……在新的社会秩序里所有的关系都是产生于个人的自由合意”^{[8](P211)},农民可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时常感受到这种“自由合意”与传统伦理之间的抵触,但在农民的主观认知中,他们对关系的理解仍然是建立在传统伦理的“差序格局”上的。正如费孝通所说的:在“差序格局”中,作为乡土社会之基本社群的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伸缩性极强。个人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9](PP24-36)}。农民对关系的满意度随着农民关系距离的拉远而下降,但即使是最低水平的农民与邻居的关系,满意度均值也高达3.856254。这说明:“满意”的标准在不同的关系层面是存在差异的:农民之间的关系越是亲密,其对不满的容忍阈限可能越高;对于同等客观互动状态下的关系,农民倾向于给予更为亲密的关系以更高的评价。^①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对私人领域关系的高满意度或许是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公共政策满意度这个指标来看,人们满意度的平均值比较高。对两个分项目的分析表明,对教育政策的评价要略高于对医疗政策的评价。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归结为:(一)政策出台:国家连续出台利农惠农政策,特别是免除中西部乃至全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的学杂费,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保障了农村广大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农民的满意度普遍较高;(二)归因上的偏误:根据既有经验研究,农民更倾向于将国家宏观的政策实施出现的不良后果归咎于基层政策的实施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因此,农民对于公共政策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与宏观和微观层次相比,农民中观层次的社区事务满意度之低下尤其值得探讨。无论是公共文化娱乐生活、村内安全维护活动还是村

委会组织活动,农民的满意度都较低。这表明农民对公共领域的构建效果,主观上并不认可。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乡村社会的失序有密切关系。从历史传统上看,在国家政权不能强有力地延伸至基层社会时,基层社会必须依靠村庄内部的力量解决服务问题。这些服务包括提供基本的公共品,处理纠纷及其他各种生产生活秩序等等。在维持基层社会正常有序运转中,家庭、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地缘群体(尤其是村庄),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10]1949年以后,国家的集体化进程对于农村的改造和控制使得宗族的力量被抑制和打压;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试图还给农村一定的自治的发育空间,宗族、地方宗教等传统村庄势力有所复兴,但仅限于部分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破坏了农村社会中的自发秩序,农村精英流失,村庄内部在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传统的村规民约在村庄传统权威的弱化下已经无法获得制度性的实施基础,无法有效地控制乡土社会。^[11]在基层官僚系统无法作为和农村传统约束力量双重缺失的情况下,农村出现了治理真空,从而催生了一批乡村混混和恶霸,^[12]一些民间纠纷也难以获得有效的梳理和调解。在村庄内部,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不同经济、社会地位背景、不同世代的农民对权威的认同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分歧。村庄管理和组织出现不同程度的涣散和缺位,使得村庄治理陷入到困境之中。

农村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满意度较低,强烈地反映了农民对村庄治理的不满。然而如何理解这种不满?在调查中,不少农民们坚持认为“总有人要来管管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包括“修路、修水渠;建水坝、打击村里的恶霸”等等),却没有直接的动力去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与利益的支持,更绝少有人表示愿意参与到这些事情的管理之中。可见这种不满仍然是一种庇护主义下被庇护者对庇护者的不满,农民们眼中的管理者不一定指向“政府”,它也指向村中的“能人”、“有钱人”等发迹的普通村民。

^①比如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家庭内的摩擦,农民可能觉得都是一家人了,一些事情“忍忍就好了”,不会对关系产生过实质性影响;而同样的纠纷如果发生在邻里之间,双方的关系评价就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以上研究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分析了村民生活满意度的构成。我们发现,从整体上而言,村民生活满意度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凹陷”态势,表现在农民对微观的社会关系以及宏观的公共政策均持较为正面的评价,而对中观的社区事务的满意度较低。这表明,农民既不是对外部世界完全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也没有表现出对社区事务高涨的参与热情。农民关心的界限取决于他们利益的边界,唯有当社区事务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实质性的勾连时,社区事务才会真正地出现在他们的视域中。

按照哈贝马斯的原意,公共领域的概念至少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涵,公共领域以讨论为中心,围绕该讨论的是广泛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单个个体或单个组织的利益。在目前的中国村庄中,并无充分条件构建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来自外部政治空间的约束,缺乏自由的政治文化氛围;从内部来看,农民们仍然秉持强烈的庇护主义思维,对于其他一般的公共事务,农民自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内在激励并不明显。农民们对文化娱乐、公共事务和社区治安的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越发强烈,不必然意味着自觉自愿的参与意识会随之提高。恰恰是在农民高涨的社区公共事务的需求与延续下来的庇护主义思维之间的裂缝,导致了农民对社区事务的失望情绪尤为严重。因此,唯有祛除农民自建国后延续下来的庇护主义思

维,培养农民自觉的参与意识,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社会生活满意度的凹陷问题。

参考文献:

- [1]王凯,周长城.生活质量研究的新发展:主观指标的构建与应用[J].国外社会科学,2004,(4).
- [2]邢占军.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J].社会,2006,(1).
- [3]方纲,风笑天.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研究述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3).
- [4]吕斐宜.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J].统计观察,2006,(9).
- [5]袁岳,张慧.2006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A].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6]王培刚,衣华亮.中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7,(6).
- [7]严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8]亨利·萨姆纳·梅因.古代法[M].高敏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 [9]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0]陈柏峰.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J].文史哲,2009,(4).
- [11]郭星华,邢朝国.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1).
- [12]陈柏峰.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结构与分层——以湖北G镇为例[J].青年研究,2010,(1).

责任编辑 周文彬

The Concave of Social Life Satisfaction Degree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village survey

GUO Xing-hua & ZHANG Jing

(School of Society and Popul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actor analys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a social life satisfaction degree, the dimensions which affect rural residents' social life satisfaction degree in China are the social relation satisfaction, the community affair satisfaction and the public policy satisfaction. The social relation satisfaction and public policy satisfaction are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community affairs satisfaction is the lowest. The whole situation reveals a typical concave. The author suppos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rural prestige has been weakened and the traditional power of rural organizations has been less effective. The low community affair satisfaction relates to the rural residents' growing public service demands and the continuity of clientelism thinking. It is crucial to advance the public policy satisfaction and develop the autonomous consciousness of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 Social Life Satisfaction Degree; Concave; Public Sphere